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

——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李春玲

提要: 本文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依据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考查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状况。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主导声望地位评价的标准是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但同时,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有可能存在。

关键词: 声望分层 职业声望 社会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社会地位的差异与经济地位的差异一样极受关注。社会地位,有时也被称为社会声望,指的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综合性价值评价,换言之,是指个人或群体所受到的社会尊敬程度。与经济地位差异相比较,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韦伯在其著名的《阶级、身份和政党》(Weber, 1966: 21)一文中,对经济分层(阶级)与社会声望分层(身份)加以区分并进行比较。他认为,社会声望分层由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直接影响,而经济分层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则不那么直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当经济差异导致了社会差异,或者说,经济分层与社会声望分层相吻合,社会分化才得以结构化,即产生了阶级或阶层,以及形成了阶级结构或阶层结构(Giddens, 1973)。这些论述揭示出社会声望分层是社会整体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

社会声望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特别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社会声望及其分化现象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国学者一般是通过职业声望调查来研究声望分层,这样只能对少数职业(一般是几十个职业)进行职业声望等级排列,但不能测量所有的职业群体或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声望地位,从而也无法描述和分析整个社会的声望分层体系。本文期望能推进这一领域的

研究,利用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尝试对所有的16—70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进行系统的声望地位测量,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体系,并发现当今的中国声望分层与以往中国社会声望体系以及西方社会的声望分层的异同。

本文采用的社会声望分层的指标和测量方法基本上参照西方社会学界的主流模式,即: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推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计算公式。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61种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和所有16—70岁非学生身份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再以此为指标,分出声望分层的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等级,由此描绘当代中国声望分层的基本形态。

除了对当前中国社会声望分层提供一个系统描述外,本文的研究还期望能对这一领域中的重要观点加以检验,对其研究方法加以推进。首先,有关声望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或争论,是崔曼(Treiman,又译崔敏)提出的工业化普遍主义的(一元化)价值与高索普(Goldthorpe)等人提出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多元化)价值的理论之争。本文通过数据资料的分析来检验这两种观点,即现今中国人的声望地位评价体现出的是普遍一致的工业主义标准还是受利益主导的、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第二,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崔曼以及豪瑟(Hauser)和沃伦(Warren)对于决定人们声望评价的因素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推算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公式,发现决定中国人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第三,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计算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由于缺乏这一量化指标,对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研究(如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分析)受到很大的局限,本文改进了布劳和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推算出具有较高解释力(也是有待进一步验证)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试图为以后对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分析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

一、社会声望的测量:理论与方法

社会声望测量也被称为社会地位等级测量,因为它是采用高低等级测量的方法分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研究者通常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身份地位或声望高低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划分出一些等级性的界

线,把个人归类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群体(Nisbet, 1959; Clark & Lipset, 1991; Hout, Brooks & Manza, 1993)。

社会声望测量的研究最初是基于帕森斯(Parsons, 1954: 77)对阶级所下的一个定义:阶级是指在有着相互关系的联合体(kinship unit)中享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这类取向的分层研究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区研究(Werner, 1949)。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社区内人们相互之间的声誉评价高低(reputational equals)来进行等级分类(比如上上阶级、上中阶级等等)。当这种测量从社区范围扩展到全国的分层系统时,测量指标不得不发生改变,因为全国性的调查无法获得人们相互之间的声誉评价。于是,学者们发展出两类测量指标——职业声望测量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来进行全国范围的声望分层。

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做的主观评价。职业声望测量一般采用如下方式:列出一些职业,让被调查者按好坏程度进行评价或按高低程度进行等级排列。研究人员再对这些好坏程度评价或高低等级排列赋予相应的分值,并计算出每个职业的声望得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得分的高低排列各类职业的声望等级,由此观察声望分层的基本规则。1950至1980年代的40年里,职业声望测量在西方分层研究领域十分盛行,大批的分层研究者都在进行职业声望的测量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Treiman, 1976, 1977; Grasmick, 1976; Inkeles & Rossi, 1956; Hall & Jones, 1959; Hatt, 1950),职业声望测量似乎成为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论题,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社会分层就是职业声望的等级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另一种测量人们社会声望地位的指标。由于职业声望的测量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而无法得知所有职业或所有社会成员的声望位置,这不能满足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声望分层的需要。于是,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达德利·邓肯(Duncan, 1961: 109—138)设计了一种方法,用以估计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①邓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所获得的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

① 邓肯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包括了两个回归方程。第一个回归方程是: $Y = a + b_1 X_1 + b_2 X_2$,其中, Y 是各职业的声望得分, a 为常数项, X_1 为各职业的教育水平, b_1 为教育的回归系数, X_2 为各职业的收入, b_2 为收入的回归系数,这一方程求出 $a = -6.0$, $b_1 = 0.59$, $b_2 = 0.55$ 。第二个回归方程是:各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 = $-6.0 + 0.59 * \text{各职业的教育水平} + 0.55 * \text{各职业的收入}$ 。

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采用这种方法所求出的声望得分,实际上是根据每一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计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为社经指数(SEI),即收入代表经济地位,教育代表社会地位,SEI就代表了人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彼特·布劳和邓肯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Blau & Duncan, 1967: 118—124)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用45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把这些职业归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群体。此后,许多社会学家都采用布劳和邓肯的方法(或者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估计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公式,根据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进行社会声望分层。同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不仅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而且也被广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

在相当长时期里,采用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的社会声望测量研究一直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尤其在美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居于主流地位,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最近十年来,社会学家对社会声望测量的兴趣开始减弱,但仍有许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而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对此仍保有浓厚兴趣,社会声望测量(主要是职业声望测量)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最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参见折晓叶、陈婴婴,1995;许欣欣,2000;蒋来文等,1991;蔡禾、赵钊卿,1995;叶南客,1997;李强、宋时歌,1998,等)。但至今为止,国内学者(包括国外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都没有尝试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或类似指标进行声望分层;而且,他们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大多也仅限于城镇居民。可以说,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的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还处于初步阶段。

二、数据资料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资料

本文采用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及直辖市(北

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内蒙) 73 个区县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为 16—70 岁人口, 获取的有效样本为 6193 个。经加权处理后, 此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在基本的人口信息和主要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方面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布极为接近, 这表明此数据有很好的代表性。^① 在此次调查样本中, 有 5.4% 是在校学生。由于在校生还未完成学业步入社会, 无法对他们进行职业、收入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归类, 从而也不能进行社会声望地位的测量。因此, 本文进行社会声望测量的数据排除了在校生样本, 实际测量样本数量为 5860 个。本文中的所有数据分析都采用了加权数据。

(二) 职业声望测量

西方社会学家发展出许多职业声望测量技术, 而国内研究者大多采用较为简化的测量方法, 如: 列出几十类职业, 让被调查者评价, 并赋予分值, 计算出各个职业的平均得分(许欣欣, 2000; 蒋来文等, 1991; 蔡禾、赵钊卿, 1995; 叶南客, 1997; 李强、宋时歌, 1998, 等)。这种测量方法有一个局限, 即测量的职业种类不能太多, 如果列出过多职业, 将使被调查者进行职业评价时感到困难或厌烦, 降低调查资料的效度。但是, 如果列出的职业种类太少, 又达不到研究职业声望的目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林南和叶晓兰(Lin & Ye, 1997)设计的分组职业声望测量方法。本研究共选择了 81 种职业进行声望测量。这 81 个职业随机分为 8 组, 每组共 11 个职业, 其中一个职业——小学教师——在每一组中都出现, 另外 10 个职业每组不同。所有的被调查者也被分为 8 组, 每组被调查者只需评价一组职业(即 11 个职业), 把 11 个职业进行高低等级排列, 排在最高的职业赋值 1, 排在最低的职业赋值 11。为了把 8 组职业评价整合在一起进行比较, 把每一组都出现的职业——小学教师——作为参照职业, 对各个职业的得分进行标准化转换, 转换后的得分再重新赋值, 使各职业得分在 0—100 分之间。最终取得的职业声望得分经过了两次标准化转换。第一次标准化转换是为了把每个组中的 11 个职业的得分排列整合起来, 转换成为 81 个职业统一的得分排列。标准化转换的公式是:

^① 此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情况请参阅陆学艺主编, 2004: 9—10。

$$Z = (X - \delta) / (S / \sqrt{n})$$

其中, X 是某个职业在其所在组中的平均得分, S 为其标准差, δ 为这一组中的参照职业(小学教师)的平均得分, n 为样本数(这一组被调查者数)。转换后 81 个职业的得分在 -50.00 至 96.22 之间(最低分为 -50.00, 最高分为 96.22), 其中小学教师是 0 分。

第二次标准化转换是为了让所有职业的得分处于 0 至 100 分之间, 以便于职业声望分值的比较观察。转换的方法是: 把最高分(96.22)和最低分(-50.00)分别赋值为 10 分和 90 分, 并建立两个方程:

$$90 = k(-50.00) + b$$

$$10 = k(96.22) + b$$

根据这两个方程, 分别求出 $k = -0.55$, $b = 62.65$, 然后把 k 和 b 代入下列回归方程:

$$Y(\text{职业声望得分}) = (-0.55)X + 62.65$$

其中, X 为第一次标准化转换的得分, 利用这一公式可以计算出每个职业的最终职业声望得分。

这种职业声望测量方法虽较为复杂, 但能取得较高的效度。

(三)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来加以测算的, 欧美学者一般采用布劳和邓肯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 即以每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并乘以相应的权数进行计算。这意味着, 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之所以能够作为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 是因为布劳和邓肯发现, 基于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变量估计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基本上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相一致。例如, 布劳和邓肯(Duncan, 1961: 109-138; Blau & Duncan, 1967: 118-124)用教育和收入推算的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与这些职业的声望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91, 其方程的 R^2 值为 0.83。这意味着, 人们对各种职业的声望评价的基本依据是这些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换句话说, 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了职业声望的高低。如果职业身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标志, 或者说, 职业声望代表了社会声望, 那么,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就可以代表人们的社会地位。

有些学者采用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 测算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 这些回归方程的解释力较低。林南和谢文(Lin & Xie, 1988: 830)利用 1983 年北京市职业声望调查数据估计出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方程是: $EII^{①} = -5.188 + 13.874 * \text{教育} + 0.262 * \text{收入}$, 这一方程的 R^2 值为 0.72。许欣欣(2000: 82)用 1999 年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调查估计的方程为: $EII = 5.622 + 15.816 * \text{教育} + 0.763 * \text{收入}$, 方程的 R^2 值为 0.765。尽管这两个方程的 R^2 值不能说很低, 但由于这两项研究用于估计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职业分类很少, ② 没有像布劳和邓肯那样把 45 项职业的声望分值代入回归方程; 同时, 也没有利用估计出来的回归方程计算更多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像布劳和邓肯那样推算出 446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方程的解释力较低。布劳和邓肯设计的这种测量方法, 可能较适用西方社会; 而与西方社会相比, 当前中国人对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更为复杂。为了提高方程的解释力, 林南和谢文及许欣欣都对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加以改进。林南和谢文在方程中加进“是否非体力劳动者”这一变量, 许欣欣则在方程中加入权力变量。新变量的加入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方程的解释力, 林南和谢文的方程 R^2 值提高 0.02, 许欣欣的方程 R^2 值提高 0.06。这表明, 中国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不仅取决于收入和教育的因素,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评价。在已有的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针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对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加以改进, 获得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方程, 估计出 161 种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所有非学生身份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由此确定每一个人的声望地位, 并进行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

本研究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估计出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职业声望评价; 第二步是根据这些因素预测所有职业和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本研究的职业声望调查, 根据人们的主观评价, 获得了 81 种职业

① EII 表示教育收入指数(education-income index), 与社会经济指数(SEI)是一个意思。

② 林南和谢文分了 7 类职业: 1. 专业人员; 2. 管理人员; 3. 办事人员; 4. 制造业、交通业及类似工人; 5. 销售人员; 6. 服务业人员; 7. 其他。许欣欣分了 15 类职业: 1. 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 2. 企业负责人; 3. 党政机关科级以下干部; 4. 企业一般干部; 5. 企业技术人员; 6. 其他专业人员; 7. 大学教师; 8. 中小学教师; 9. 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10. 工人; 11. 个体劳动者; 12. 退休工人; 13. 无固定职业者; 14. 退休干部; 15. 农民。

的声望得分(参见表 1)。同时,我们也收集了被调查者的职业身份、收入、教育水平及其他相关信息。5860 个被调查者(非学生身份的 16—70 岁人口)的职业身份涵盖了 81 种职业中的 75 种,只有 6 种职业(市长、国务院部长、电影明星、体育运动员和殡葬场火化工)没有被我们的调查所抽中。我们以 75 种职业的声望得分作为应变量,以这 75 种职业的月收入和教育年限为自变量(与布劳和邓肯的回归方程一致),估计出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方程。但这一方程的解释力较低, R^2 值为 0.64,方程所预测出的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职业声望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教育和收入的权数分别为 3.496 和 0.589,其回归方程如下:

职业声望 $Y = 10.868 + 3.496 * \text{平均教育年限} + 0.589 * \text{平均月收入(百元)}$

这一结果说明,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因素,对于中国人的声望地位评价能提供约 $2/3$ 的解释。同时,数据显示,同样职业的人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上差距较大,尤其在收入方面,有些职业的收入的标准差接近或超过均值。这一点与西方社会很不同。在西方社会,相同职业的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较为接近;而当前中国社会则是同样的职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部门对文化水平有不同的要求,经济报酬也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仅以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来估计职业声望或社会地位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显然,除了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些与职业或工作相关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声望地位。

在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同样的职业,但处于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行业部门,人们给予的声望评价是不同的。同时,权力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评价。另外,有少数职业被人们特别看不起(如保姆、捡破烂的人等),尽管其收入并不一定很低,其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与其他非技术性工作的从业者之间差距也不是很大。如果仅以各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来预测其社会地位,那么就可能高估它们的位置。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对原有方程加以改进。除了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变量以外,在方程中我们增加了 3 个因素:1. 权力因素,包括 3 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中层管理者、

是否是单位的基层管理者^①；2. 部门因素，包括3个虚拟变量：是否就业于党政机关、是否就业于事业单位、是否就业于企业单位；3. 社会歧视因素，包括1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受歧视职业。

加入上述变量后获得下述回归方程：

职业声望 $Y = 11.808 + 3.349 * \text{平均教育年限} + 0.573 * \text{平均月收入(百元)} + 16.075 * \text{最高管理者} + 11.262 * \text{中层管理者} + 3.738 * \text{基层管理者} + 8.942 * \text{党政机关} + 6.841 * \text{事业单位} - 5.694 * \text{企业单位} - 26.655 * \text{受歧视职业}$ 。

改进后的回归方程的解释力有明显提高， R^2 值上升为 0.81。这就是说，上述这些因素能对人们的声望评价提供 45% 的解释力，方程预测出的声望分数与人们主观评价的职业声望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9。这一结果与布劳和邓肯设计的方程的解释力十分接近。我们采用这一方程来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代表各种职业的声望地位以及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依据这一指标划分出高低不同的声望群体，即社会声望分层。

三、职业声望排列

根据前面介绍的调查方法和计算公式，我们获得了 81 种职业的声望得分，表 1 列出了这些职业的声望得分和等级排列(见表 1)。

(一) 职业声望排列

从表 1 列出的 81 种职业的声望得分和高低排列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得分最高的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90.15 分)，得分最低的是“保姆”(9.73 分)。81 个职业的得分排列，大致可归类为 7 个等级声望群体。

得分最高的一组在等级排序中排在前 8 位，得分在 85 分以上。主要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县委书记等)和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科学家、大学教授、大学教师等)。

① 最高层管理者指其上面没有更高层的管理者同时下面有较低层的管理者(即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者指其上面有更高层管理者同时下面有较低层管理者(大多是部门负责人)；基层管理者指其上面有更高层的管理者但下面没有较低层管理者(大多是科室负责人)。

表 1 全国职业声望得分排列及城乡比较

得分 排序	全 国		城 镇		农 村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1	市人大主任	90.15	市人大主任	90.07	法院院长	90
2	市长	89.87	市长	89.26	市长	88.62
3	法院院长	88.61	工程师	88.24	市人大主任	87.5
4	工程师	87.92	大学教师	87.59	工程师	84.93
5	科学家	86.49	法院院长	87.52	科学家	82.8
6	县委书记	85.18	科学家	87.31	县委书记	82.62
7	大学教授	85.15	大学教授	85.72	大学教授	81.83
8	大学教师	85.14	县委书记	85.3	政府机关局长	80.69
9	政府机关局长	81.1	中学教师	81.15	大学教师	78.68
10	外资企业经理	80.15	外资企业经理	81.11	国务院部长	77.54
11	政府机关科长	79.87	政府机关局长	81.03	国营企业厂长	77.15
12	中学教师	79.4	政府机关科长	80.58	政府机关科长	77.02
13	中学校长	78.18	中学校长	78.97	外资企业经理	76.63
14	国营企业厂长	78	律师	77.8	集体企业厂长	75.51
15	报社记者	77.32	国营企业厂长	77.54	报社记者	75.45
16	律师	76.12	报社记者	77.47	中学校长	75.09
17	国务院部长	75.96	国务院部长	75.73	中学教师	74.65
18	集体企业厂长	74.95	机关政工干部	75.31	电影明星	72.55
19	电影明星	73.43	电视台主持人	74.02	律师	71.69
20	机关政工干部	72.41	集体企业厂长	73.8	工商税务人员	69.9
21	电视台主持人	72.12	政府机关办事员	73.13	作家	69.89
22	工商税务人员	71.58	电影明星	73.11	银行出纳员	69.18
23	作家	71.3	工商税务人员	71.88	乡镇长	67.83
24	银行出纳员	71.28	银行出纳员	71.84	电视台主持人	67.53
25	政府机关办事员	71.18	作家	71.3	警察	66.94
26	飞机驾驶员	69.46	飞机驾驶员	70.71	政府机关办事员	66.58
27	警察	69.44	体育运动员	70.32	机关政工干部	66.3
28	体育运动员	68.21	警察	70.06	飞机驾驶员	66.09
29	医生	67.04	医生	69.55	私营企业老板	65.66

续表 1

得分 排序	全 国		城 镇		农 村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30	企业技术员	67.01	企业技术员	68.36	市民主党派负责人	63.87
31	市民主党派负责人	66.72	市民主党派负责人	67.92	企业技术员	63.64
32	私营企业老板	66.64	私营企业老板	66.77	体育运动员	63.64
33	乡镇长	65.8	乡镇长	65.73	医生	61.58
34	服装设计师	63.53	服装设计师	65.57	建筑队包工头	60.13
35	小学教师	62.65	小学教师	64.73	企业工会主席	59.52
36	军人	62.53	军人	64.5	服装设计师	59.29
37	企业工会主席	60.36	企业工会主席	60.71	军人	58.51
38	建筑队包工头	59.66	建筑队包工头	59.54	小学教师	58.4
39	企业采购员	57.79	企业采购员	59.04	企业采购员	55.14
40	机关单位 小轿车司机	57.11	机关单位 小轿车司机	58.68	居委会主任	54.47
41	幼儿园老师	56.48	幼儿园老师	58.49	机关单位 小轿车司机	54.13
42	服装模特	54.98	服装模特	56.86	幼儿园老师	52.85
43	居委会主任	54.79	居委会主任	54.92	护士	52.02
44	护士	53.8	会计	54.8	服装模特	51.58
45	保险公司业务员	52.94	护士	54.8	保险公司业务员	51.24
46	村委会主任	52.12	保险公司业务员	54.16	村委会主任	51.13
47	会计	51.54	邮递员	53.01	外资企业电工	50.51
48	邮递员	50.96	村委会主任	52.78	养殖专业户	48.81
49	养殖专业户	50.04	养殖专业户	50.97	邮递员	47.61
50	外资企业电工	49.43	外资企业电工	48.87	推销员	47.33
51	集体企业电工	47.69	农机站技术员	48.53	集体企业电工	46.85
52	个体运输专业户	47.42	电脑打字员	48.52	个体运输专业户	46.47
53	推销员	46.67	集体企业电工	48.27	会计	45.66
54	农机站技术员	46.19	个体运输专业户	48.22	私营企业电工	43.92
55	电脑打字员	45.4	兽医	47.19	国营企业电工	42.86
56	兽医	44.84	推销员	46.71	个体小商店店主	42.74
57	国营企业电工	44.58	国营企业电工	46.1	农机站技术员	42.7

续表 1

得分 排序	全 国		城 镇		农 村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职 业	声望得分
58	私营企业电工	44.57	饭店厨师	45.64	建筑工人	41.42
59	饭店厨师	43.78	私营企业电工	44.78	饭店厨师	41.17
60	个体小商店店主	42.67	出租汽车司机	44.29	兽医	41.12
61	出租汽车司机	42.02	宾馆服务员	42.86	电脑打字员	40.17
62	宾馆服务员	40.75	个体小商店店主	42.83	出租汽车司机	39
63	建筑工人	39.8	殡葬场火化工	41.95	图书管理员	38.16
64	图书管理员	39.78	矿工	41.45	宾馆服务员	38.01
65	殡葬场火化工	37.1	图书管理员	41.23	个体裁缝	37.51
66	矿工	37.07	建筑工人	39.2	理发师	34.09
67	理发师	36.92	理发师	39.2	车工	34.01
68	纺织工人	36.36	清洁工	38.85	纺织工人	33.75
69	清洁工	34.79	纺织工人	38.61	殡葬场火化工	29.38
70	个体裁缝	34.35	公共汽车售票员	36.08	商店营业员	29.08
71	公共汽车售票员	32.37	种田农民	35.7	清洁工	28.85
72	种田农民	31.82	渔民	33.7	矿工	28.71
73	渔民	29.91	个体裁缝	32.83	农民工	28.51
74	车工	29.12	印刷工人	30.46	公共汽车售票员	26.69
75	商店营业员	28.62	商店营业员	29.37	印刷工人	26.39
76	印刷工人	28.33	菜市场小摊贩	28.77	种田农民	25.8
77	农民工	28.22	农民工	27.67	渔民	25.17
78	菜市场小摊贩	26.35	车工	25.66	菜市场小摊贩	23.95
79	三轮车夫	15.91	搬运工	18.54	三轮车夫	20.83
80	搬运工	14.71	三轮车夫	14.78	保姆	12.78
81	保姆	9.73	保姆	9.58	搬运工	10.65

第二组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在第 9 位至第 18 位,得分约在 75 分至 80 分之间。主要包括中层领导干部(如政府机关局长、政府机关科长、

国务院部长^①、各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外资企业经理、国营企业厂长、集体企业厂长)和一些收入较高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专业人员(如中学教师、中学校长、报社记者、律师^②)。

第三组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在第 19 位至第 33 位,得分约在 65 分至 75 分之间。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如电影明星、电视台主持人、作家、飞机驾驶员、体育运动员、医生、企业技术员等)、政府部门的普通干部(如机关政工干部)、特殊行业(具有特权的部门或高经济效益的行业)的办事人员(如工商税务人员、政府机关办事员、银行出纳员、警察等)、农村地区领导干部(如乡镇长)、市民党派负责人和私营企业老板。

第四组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在第 34 位至第 47 位,得分大约在 50 分至 65 分之间。主要包括较低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服装设计师^③、小学教师、幼儿园老师、服装模特儿、护士、会计等)、普通办事人员(包括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如军人、居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等)、收入较高并具有准白领职业特征的商业服务业员工(如企业采购员、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保险公司业务员)以及企业工会主席和建筑队包工头。

第五组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在第 48 位至第 61 位,得分大约在 40 分至 50 分之间。主要包括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如农机站技术员、兽医等)、技术工人(如外资企业电工、集体企业电工、国营企业电工、私营企业电工等)、具有一定技能专长的商业服务业员工(如邮递员、推销员、饭店厨师、出租汽车司机等)、个体户或专业户(如养殖专业户、个体运输专业户、个体小商店店主等),以及较低层办事人员或低层白领职业(电脑打字员)。

第六组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在第 62 位至第 78 位,得分大约在 26 分至 40 分之间。主要包括无需技术专长的、劳作性的(即体力或半体力性的)工人(如建筑工人、矿工、纺织工人、车工、印刷工人、农民工等)、商业服务业员工(如宾馆服务员、图书管理员、殡葬场火化工、理发师、

① 一部分农民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不清楚或完全不知道“国务院部长”这一行政职位,因此它被误排在这里。

② 由于大学多集中于大城市中,在小城市、小城镇及农村地区,中学教师在人们眼中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另外,近年来,传媒领域开展的大规模司法宣传和对各级政府的舆论监督行动,使记者和律师成为社会知名度较高的职业。

③ 可能是由于许多人不太了解“服装设计师”这一职业,因此对它的声望评价略低于一般的专业技术人员。

清洁工、公共汽车售票员、商店营业员、菜市场小摊贩等)、农业劳动者(如种田农民、渔民)和小个体户(个体裁缝)。

第七组包括职业声望最低(排在79—81位)的三个职业:三轮车夫、搬运工和保姆,声望得分在9分至16分之间。这三个职业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下九流或低贱性质的职业,即卖苦力或伺候人的工作。

上述职业声望得分排列反映出当今人们对社会声望地位评价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

首先,处于社会地位最高等级的人是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也就是说,对拥有最多权力资本的人和拥有最多文化资本的人,人们给予最高的声望评价。已有的几次调查数据也得出相同的结论(Lin & Xie, 1988; 折晓叶、陈婴婴, 1995; Lin & Ye, 1997; 许欣欣, 2000),不过,对不同年代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变化。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的调查数据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调查数据相比较,有一个方面的结论刚好相反。前一个时期的调查数据——林南和谢文于1983年的调查数据(Lin & Xie, 198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课题组于1987年的调查数据(许欣欣, 2000)和“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于1993年的调查数据(折晓叶、陈婴婴, 1995; Lin & Ye, 1997),尽管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获得最高声望评价;但是,高级领导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这两类人相比,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略高于高级领导干部。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两次调查数据——许欣欣于1999年的调查数据(许欣欣, 2000)和本研究于2001年的调查数据,则获得相反的结论:高级领导干部的声望排列略高于高级知识分子。这表明,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社会声望地位的价值评价方面,“官本位”倾向有所发展;而同时,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名望在逐渐下降。在中国传统价值评价体系中,文人名士才是真正的社会名流,他们的名望地位往往比高官甚至皇族还高,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精神贵族和精神领袖。这种传统价值倾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的声望评价中仍有所表现,但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调查数据则显示出,一些传统知识分子职业(如科学家、大学教授、作家等)的声望排名有所下降。

其二,传统知识分子声望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文化资本的社会价值贬值。相反,当今人们的职业声望评价显示出文化资本增值的趋向,只不过这种增值主要表现在对功能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业评价上,而没有表现在对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评价上^①。本次调查与前几次调查数据的职业声望排列相比,教师(包括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小学教师)的声望排名明显提高。这反映出,人们对于教育资源(或人力资本)给予越来越高的价值评价,而提供或掌握这种资源的人(教师)就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地位。另外,工程师、律师等专业技术性知识分子的声望排名也有所提高。

其三,与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相比,企业家的社会声望地位略低。这意味着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对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价值评价高于经济资本。各类企业的负责人的声望地位与中层领导干部和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排名接近。拥有最多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的声望地位则接近较低层领导干部和较低层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排名。

其四,所有制因素对人们的价值评价仍有影响。不论是对企业负责人还是对普通职工的声望评价,外资企业员工的声望地位最高,其次是公有制(国营和集体)企业员工,声望地位最低的是私营企业员工。

其五,一些特权部门(如公检法及工商税务等)和高经济收益行业(如银行等)的从业者获得较高声望评价,比如法院院长、工商税务人员、银行出纳员、警察等等,他们获得的声望地位高于其他部门或行业的类似职业。

其六,与前几次职业声望地位调查数据相比,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业劳动者(农民、渔民)的声望排名略有提高。在以往的职业声望排列中,农民一般排在倒数第二或第三(通常只高于保姆职业),而表1的数据则显示,种田农民排在倒数第十位,渔民排在倒数第九位,这两个职业的声望得分高于车工、商店营业员、印刷工人等职业。这表明,在较低声望群体中,城乡差异在弱化,城里人并不一定比农村人地位更高。但是,在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评价中,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农机站技术员、兽医等)的声望地位明显比城市专业技术人员低很多。

最后,本次调查得出的职业声望等级排列的基本格局,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职业声望调查结果大体一致。崔曼采用“国际标准职业声望

^① 传统知识分子通常是指人文科学专业或理论性研究的知识分子,如作家、诗人、哲学家、文论家等;功能性知识分子大多是应用性学科的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医生、会计师、教师等。

量表”，对六十多个国家的职业声望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各国对职业声望的高低评价非常接近，其相关系数高达 0.81。他因此而得出结论：职业声望有其不变性，不因国情不同、文化不同而不同，这是由于复杂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功能的必要和组织的必要所造成的 (Treiman, 1977: 5)。前引历次中国社会职业声望调查也得出相同结论 (Lin & Xie, 1988; 折晓叶、陈婴婴, 1995; Lin & Ye, 1997; 许欣欣, 2000)，本次调查结果也不例外。这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职业声望等级排列，反映出工业化社会的职业等级分化的普遍特征，即：白领职业（脑力劳动者）的声望高于蓝领职业（体力劳动者）；在白领职业中，具有较多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高层白领（拥有管理权的人和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的声望高于中低层白领；在蓝领职业中，技术工人的声望高于非技术工人。同时，与前几次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得出的职业声望排列，更加接近崔曼的“国际标准职业声望”排列（参见 Treiman, 1977: 235—259）。这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前半期的职业声望排列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于高级领导干部，而本次调查结果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声望地位高于高级知识分子，这与崔曼的“国际标准职业声望”排列相一致。2. 以往的职业声望排列中，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略高于功能性知识分子，而本次调查则显示相反趋势，这一点也与崔曼的相应排列一致。3. 在以往的职业声望排列中，农业劳动者属于最低声望群体，而在本次调查的职业声望排列中他们虽还处于较低声望，但并不是最低的，这也与崔曼的相应排列相同。4. 本次调查的职业声望排列中，企业主和企业经理人员的声望地位明显低于他们在崔曼的相应排列中的位置，但是，与前几次调查相比，他们的声望地位已明显提高。这些变化趋势反映出，中国的职业声望分层体系与工业化社会的普遍趋势越来越相一致。

（二）职业声望的城乡差异

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异很大，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地位的价值评价标准都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职业声望作为社会地位的一个测量指标只适用于城市社会，而不适用于农村社会，因为农村社会不存在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分工体系或职业结构；职业身份并不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不依据于职业。还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文化水平低和信息缺乏，

许多农村人不能理解或根本不知道调查表所列出的各类职业的含义,无法进行职业声望的评价。因而,以往大多数中国职业声望的测量仅限于城市居民(Lin & Xie, 1988; 许欣欣, 2000),或者把城市与农村分开来进行研究(折晓叶、陈婴婴, 1995)。然而,本次调查所得出的城乡职业声望排列却显示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 81 种职业的声望等级排列差异不大(参见表 1),城镇居民对各类职业的声望评分与农村居民的评分相关系数高达 0.979;而且,农村居民对有关职业声望这道题的回答率超过 90%。这表明,近年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开放,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评判标准逐渐与城镇居民趋同。尽管农村的职业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职业在农村当地并不存在,但多数农村居民仍能做出评判,也就是说,城乡之间正在形成一致性的社会地位评价体系。由此可以推测,职业声望的测量既适用于城市社会也适用于农村社会。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对某些职业的声望评判上有所不同。城镇居民对下列职业的声望排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1. 中学教师: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9 位, 声望得分 81.15,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17 位, 声望得分 74.65; 2. 政工干部: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18 位, 声望得分 75.31,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27 位, 声望得分 66.3; 3. 会计: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44 位, 声望得分 54.8,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53 位, 声望得分 45.66; 4. 农机站技术员: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51 位, 声望得分 48.52,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其在第 57 位, 声望得分 42.7; 5. 电脑打字员: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52 位, 声望得分 48.52,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61 位, 声望得分 40.17; 6. 矿工: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64 位, 声望得分 41.45, 农村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72 位, 声望得分 28.71。另外还有些职业, 城镇居民的排列高于农村居民的排列, 它们是: 大学教师、中学校长、律师、电视台主持人、政府机关办事员、医生、小学教师、兽医、宾馆服务员、殡葬场火化工、清洁工、公共汽车售票员、种田农民、渔民等。

农村居民对下列职业的声望排名明显高于城镇居民: 1. 乡镇长: 农村居民将其排在第 23 位, 声望得分 67.83, 城镇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33 位, 声望得分 65.73; 2. 建筑工人: 农村居民将其排在第 58 位, 声望得分 41.42, 城镇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66 位, 声望得分 39.2; 3. 个体裁缝: 农村居民将其排在第 65 位, 声望得分 37.51, 城镇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73 位, 声望得分 32.83; 4. 车工: 城镇居民将其排在第 67 位, 声望得分

34.01, 城镇居民则将其排在第 78 位, 声望得分 25.66。被农村居民排在前的职业还有: 法院院长、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国营企业厂长、集体企业厂长、电影明星、工商税务人员、警察、私营企业老板、建筑队包工头、居委会主任、外资企业电工、推销员、私营企业电工、个体小商店店主、商店营业员、农民工等。

城乡居民职业声望排列的上述不同, 反映出城乡价值评价的几个特殊之处。城镇居民对专业技术性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这意味着, 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 更看重文化资本。同时, 城镇居民对农业劳动者的评价也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认为, 农民的社会地位要比城镇中的最下层人员(失业下岗人员、低收入的重体力劳动者和从事脏活或伺候人工作的人)好。而农村居民对特权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法院院长、工商税务人员、警察等)的声望评价高于城镇居民。另外, 他们对收入较高的私营个体经营者(如私营企业老板、建筑队包工头、个体商店店主、个体裁缝等)的声望评价高于城镇居民。这说明, 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 更看重经济资本。

(三) 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比较

表 2 列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对 81 种职业的职业声望评价得分的相关系数矩阵。总体来看, 表中所列的各分类社会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极高的相关性。首先, 不同社会阶层——白领阶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自雇阶层(个体经营者和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职业声望评价没有明显的差异, 除了白领阶层与自雇阶层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是 0.98, 其余相关系数都在 0.99 以上。第二, 不同性别的职业声望评价极为类似, 男性与女性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高达 0.995。第三, 不同年龄的人的职业声望评价也很相近, 3 个年龄段的人(16—30 岁、31—50 岁、51—70 岁)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基本上都是 0.99。第四, 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的职业声望评价也没有多大差异, 5 个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无学历、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都在 0.98 以上; 不过, 相对而言, 文化水平越接近的群体(如初中与高中及中专), 相关系数越高, 反之, 文化水平差距越大的群体, 相关系数越小(如无学历与大专及以上)。

表 2 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矩阵

	管理 人员 \ 专业 人员 \ 办事 人员	个 体 经 营 者 \ 个 体 劳 动 者	工 人	农 民	女 性	16- 30 岁	31- 50 岁	51- 70 岁	无学 历	小 学	初 中	高中 \ 中专	大 专 及 以 上
管理 人员 \ 专业 人员 \ 办事 人员	1. 000	. 984	. 991	. 987	—	—	—	—	—	—	—	—	—
个 体 经 营 者 \ 个 体 劳 动 者	—	1. 000	. 988	. 987	—	—	—	—	—	—	—	—	—
工 人	—	—	1. 000	. 993	—	—	—	—	—	—	—	—	—
农 民	—	—	—	1. 000	—	—	—	—	—	—	—	—	—
男 性	—	—	—	—	. 995	—	—	—	—	—	—	—	—
16-30 岁	—	—	—	—	—	1. 000	. 991	. 988	—	—	—	—	—
31-50 岁	—	—	—	—	—	—	1. 000	. 992	—	—	—	—	—
51-70 岁	—	—	—	—	—	—	—	1. 000	—	—	—	—	—
无学 历	—	—	—	—	—	—	—	—	1. 000	. 986	. 985	. 979	. 978
小 学	—	—	—	—	—	—	—	—	—	1. 000	. 994	. 991	. 987
初 中	—	—	—	—	—	—	—	—	—	—	1. 000	. 992	. 987
高中 \ 中 专	—	—	—	—	—	—	—	—	—	—	—	1. 000	. 986
大 专 及 以 上	—	—	—	—	—	—	—	—	—	—	—	—	1. 000

四、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采用前面部分介绍的回归公式,我们计算了各类职业群体和所有非学生身份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一) 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本次抽样调查共区分出 300 多个职业分类,但由于样本数量所限,

有些职业的从业者我们的调查没有抽中, 还有些职业的从业者虽然被抽中, 但数量太少, 因此, 我们把原先的 300 多个职业细类归并为 161 种职业分类。利用前部分介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 我们获得了这 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①

与表 1 所列的职业声望得分相比较, 我们发现, 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排列顺序与职业声望分数的高低排序大体上是一致的。根据 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排列, 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 24 个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群体。

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群体应该是党政高级领导干部(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 只是我们的调查未能抽中这类人。

第 2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如大学教授、知名科学家等等,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 90 分, 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排列中位居第 1 位。

第 3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党政中层领导干部, 如各类党政机关的局长和处长,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 87 分, 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排列中位居第 3 位。

第 4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如医院院长、报社社长、学校校长等,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84—85 分之间, 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4 位至第 6 位。

第 5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普通干部, 如各类机关的科长、乡镇长和街道主任等,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81—84 分之间, 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5 至第 10 位。

第 6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传媒、司法、教育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如记者、律师、教师等,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79—83 分之间, 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8 位至第 12 位。

第 7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三资、国营、私营企业的厂长和经理, 以及第三产业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① 由于篇幅所限, 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的排列表省略。161 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和比例分布可参见作者即将发表的著作《断裂还是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8—79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11 位至第 14 位。^①

第 8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公、检、法、司、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执法人员,如警察、工商人员、税务人员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76—77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16 位至第 21 位。

第 9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普通公务员,如政府机关的办事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75—77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17 位至第 22 位。

第 10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医疗、工程、经济类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 75 分,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23 位至第 25 位。

第 11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 74 分,得分排列是第 26 位。

第 12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以及第二产业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如乡镇企业的厂长、工矿企业的车间主任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68—73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29 位至第 38 位。

第 13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中低层专业技术人员,如护士、技术员、小学教师、幼儿教师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69—73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27 位至第 37 位。

第 14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后勤、政工、文秘、财务人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64—72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31 位至第 46 位。

第 15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各类企业的后勤、政工、行政人员和业务员、经销人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 59—67 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39 位至第 78 位。

第 16 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如兽医、乡村医生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 64 分,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 45 位。

① 三资企业厂长、经理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分很高(87.99),仅次于大学教师。但是,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只有 3 个人是三资企业厂长、经理,而且他们的企业都属于高经济收益的高新技术行业,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很高,因此,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得分很高。从这种情况来看,高新技术行业的厂长、经理(即现在所谓的 CEO)的声望地位基本上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相似。但其他行业的三资企业厂长、经理没有那么高的声望地位。

第17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小店主、小作坊主和其他个体经营者,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54—64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44位至第113位。

第18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商业服务业普通员工,如客运汽车驾驶员、邮递员、出租车司机、理发师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54—64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47位至第112位。

第19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产业工人,指制造业的生产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48—59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77位至第147位。

第20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农业专业户,如水果专业户、养渔专业户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48分,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148位。

第21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普通农民和渔民,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43—47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151位至第155位。

第22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个体劳动者,如修鞋匠、个体屠夫、街头小贩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39—54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115位至第157位。

第23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重体力工人,如搬运工、装卸工、采矿工、建筑工等,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45—51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139位至第154位。

第24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从事如保姆、钟点工、人力三轮车夫等工作,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在34—40分之间,在得分排列中的位置是第158位至第161位。

(二)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及其构成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被认为是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因此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者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社会声望分层或社会地位分层。在这里,我们也采用前面计算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进行当前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我们把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在80—100分之间的人归为上层,60—79分归为中上层,40—59分归为中层,20—39分归为中下层,0—19分归为下层。如此归类的结果是:属于上层的人在社会声望分层中占1.2%,属于中上层的人占13.7%,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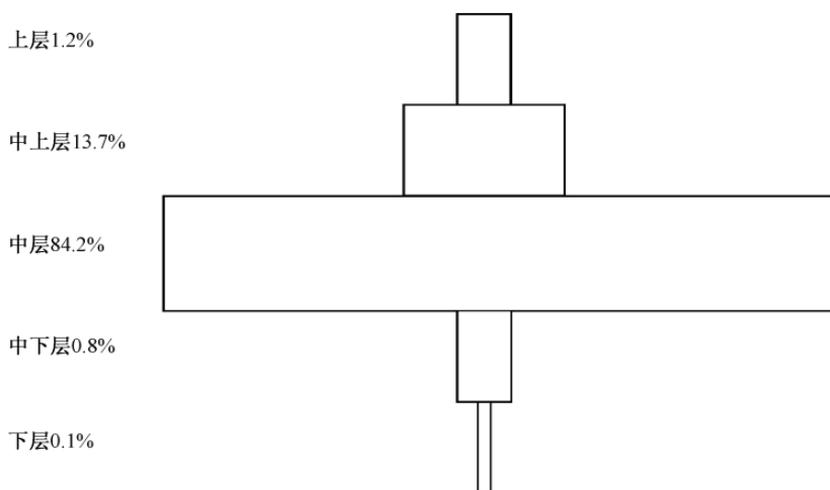


图1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

于中层的人占 84.2%，属于中下层的人占 0.8%，属于下层的人占 0.1%（见图 1）。如此比例显示，在当今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人（超过 $4/5$ 的人）的社会声望位置都居于中层，另有约超过 $1/7$ 的人居于中上层，而处于上层、中下层和下层的人的比例极少。我们所分析的抽样样本是适龄社会人口（即 16—70 岁非学生身份的人口），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适龄人口总数约为 85817.9 万，据此推算，属于声望上层的人共有 1029.8 万，属于中上层的人数是 11757.1 万，属于中层的人数是 72258.7 万，属于中下层的人数是 686.5 万，属于下层的人数是 58.8 万。当代中国社会声望分层的形态展现出菱形结构，即中间部分很宽，两端狭窄。这也就是说，从社会声望分层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存在着庞大的中间层人群，这为中产阶层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种基础。

表 3 列出各类职业的人在 5 个声望等级中的分布比例（见表 3）。声望分层的上层成员人数很少，他们可以算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主要由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三部分人组成，其中，党政领导干部所占比例最高，约占 $2/5$ （39.3%），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接近 $3/10$ （27.9%），经理人员约占 $1/5$ （21.3%），这三部分人在整个上层中所占比例接近 90%。另外，略超过 $1/10$ 的人是私营企业主（6.6%）和办事人员（4.9%）。其余的五类职业——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成员没有一个进入声望分层的上层。

表 3 各职业群体在声望分层中的分布 (%)

职业 声望 分层	党政领 导干部	经理 人员	私营 企业主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 人员	个体工 商户	商业 服务业 员工	产业 工人	农业 劳动者	无业失 业半失 业者	合计
上层	39.3	21.3	6.6	27.9	4.9	.0	.0	.0	.0	.0	100.0
中上层	2.2	6.8	7.3	23.9	30.9	13.2	12.4	3.2	.1	.0	100.0
中层	.0	.1	.2	.0	2.3	11.8	10.3	13.2	54.9	7.1	100.0
中下层	.0	.0	.0	.0	.0	.0	73.2	.0	26.8	.0	100.0
下层	.0	.0	.0	.0	.0	.0	100.0	.0	.0	.0	100.0

在中上层中,办事人员所占比例最高(30.9%),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23.9%),再其次是个体工商户(13.2%)和商业服务业员工(12.4%),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产业工人所占比例很低,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几乎没人进入中上层。

声望分层的中层成员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最高,超过半数的中层成员是农业劳动者(54.9%),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各约占1/10(11.8%、10.3%、13.2%),其余各阶层成员占的比例很低。

中下层基本上由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组成,农业劳动者占73.2%,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占26.8%。

下层成员主要是由少数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者组成。由于下层成员人数在整个声望分层中的比例极低,表3的加权数据无法准确估计出各阶层的比例。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及其分析,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1. 在人们的声望地位评价方面,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的、一元化价值成为主导性的价值标准,而且,这种工业化普遍主义价值的影响力还在继续增长;但同时,单位身份和城乡分割对中国人的声望地位评价有显著影响,这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声望评价标准。

崔曼 (Treiman, 1976) 的国际比较研究得出三个著名的结论: 1. 不论声望评价的内容是什么——“声望” (prestige)、“社会地位” (social standing) 或“声誉” (respect), 也不论采取何种评价方式——等级排列或打分形式, 所有国家——不论其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的职业声望高低排列都是一致的; 2. 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有文化的人、穷人还是富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也都有一致性的职业声望评价; 3. 所有国家——不论发展水平和职业分布结构——都存在着相同的职业分类。这三个结论意味着, 在当今的所有社会, 存在着一致性的声望地位价值评价体系, 它是以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价值为基础的。与崔曼的观点相反, 高索普和豪普 (Goldthorpe & Hope, 1972: 23—79) 则对声望评价有另一种理解。他们认为, 声望地位评价代表着社会中的各类人群 (集体) 对于“意义和价值”的解释, 它与经济收入、物质财富的拥有量或权力等级地位高低的测量不同。“意义和价值”不能是单维度的高低或多少的评价。属于不同社会集体的成员, 因为追求的目标不同, 对“意义和价值”理解也不同, 因此,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所谓的职业声望测量或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只是根据各类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产生了一种综合性的价值判断。就是说, 高索普和豪普认为, 不同的社会及不同的社会群体, 应该有不同的声望地位判断标准。

国内学者也存在着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早期的职业声望研究更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而近年来的研究更强调普遍一致的价值趋向。如, 折晓叶、陈婴婴的职业声望研究 (1995) 认为, 中国人的职业声望评价受单位身份和户口身份的影响, 许欣欣的职业声望研究 (2000) 发现权力因素和所有制因素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影响。不过, 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崔曼的观点, 即中国社会的声望评价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与此同时, 绝大多数的中国职业声望研究是针对城镇居民的职业声望评价进行测量, 学者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即: 中国城镇社会的声望评价与农村社会不同。城镇社会的声望评价与其他工业化社会相一致, 因为城镇社会已是工业化社会并存在工业化社会的职业结构; 而农村社会则不同, 那里不存在工业化社会的职业结构, 其声望评价的标准不同, 也许农村人不是根据职业分类来进行声望地位评价。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一方面强烈支持了崔曼的观点, 即: 不论城里

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文化的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不论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不论白领阶层还是蓝领阶层,职业声望评价基本趋于一致,不同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保持在0.98—0.99之间。同时,本次调查的职业声望得分排列与崔曼的国际标准职业声望排列也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并且,与以往调查结果相比较,这种一致性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仔细观察81种职业的声望得分排列和161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排列,会发现中国的职业声望排列也有与崔曼的国际标准职业声望排列的不同之处。比如,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地位远远低于城镇专业技术人员;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类型单位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声望地位有差异;部分特权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声望地位高于其他部门的同样职业的人。很明显,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结构因素,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分割,如城乡分割,所有制或行业部门的分割;处于被分割的不同领域中的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有所差异,因而,相同职业的人就可能因处于不同的领域而获得不同的声望地位评价。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导致中国的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排列与崔曼的国际标准职业声望排列产生根本性的区别,总体上的声望等级排列仍体现出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

2. 工业化普遍主义价值成为主流的同时,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有可能存在。

尽管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的结果证实了崔曼的看法,但也不能说,高索普和豪普所说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完全不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多元化的价值倾向,而不完全是由一元化价值所主导。在社会地位评价方面,西方社会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价值评价体系,而中国社会则不同。近一个世纪以来,剧烈的政治经济变动,使中国传统价值评价体系不断地遭受颠覆,而价值体系的重建又有相互冲突及多元选择倾向。传统中国社会的尊卑位序是“士、农、工、商”的排列,即文人官员位于最高社会地位,而有钱的商人则得到最低的社会评价。20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初步发展,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等),买办和民族资本家试图倡导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价体系,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评价体系和新萌生的资本主义价值评价体系予以彻底颠覆,原来倍受社会推崇的文人、名

士、官僚、乡绅被贬低至社会底层,而同时,普通的工、农、兵获得了最高的社会价值评价。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略有复兴,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能力主义等价值盛行于世,这导致了相互冲突的、多元化的价值评价取向。毫无疑问,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的结果显示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已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但这并不能否认,不同利益的人群认同完全一致的声望评价标准。凭直观的经验观察,我们也能感觉到某些利益群体的成员信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以往的文人名士的后代们更倾向于认同传统的声望评价标准,而前国有大企业的工人们则希望毛泽东时代的声望评价标准能保留下来。然而,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是不能反映出这些人群的价值评价倾向的,正如高索普和豪普所说,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结果所代表的是占总人口比例较大的人群的一种综合性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多元价值评价标准,导致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与自我地位评价结果的明显的不一致性。^①

3. 在当前中国社会,决定职业和个人声望地位的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的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

布劳和邓肯的研究(Blau & Duncan, 1967)认为,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各类职业的声望地位,而且教育和收入对声望地位的作用力差不多。因而,他们用教育和收入这两个指标预测人们的声望地位。崔曼的国际比较研究(Treiman, 1976)认为,职业所要求的技术等级、职业所具有的对人的权威和职业所具有的对物(经济资本)的控制,决定了职业的声望地位,但他也是用教育和收入来预测人们的声望地位;不过,他认为教育对声望地位的影响要大于收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教育和收入是决定声望地位的最主要的因素。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对此提出疑问,因为人们发现,按照布劳和邓肯提供的方法,用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变量回归预测职业声望得分,通常不能达到布劳和邓肯所获得的解释力。豪瑟和沃伦的研究(Hauser & Waren, 1997)则发现,收入水平对声望地位没什么影响,声望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

^① 由于篇幅所限,自我地位评价的分析省略,这一部分的数据分析显示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与自我地位评价不太一致,参见作者即将发表的著作《断裂还是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但他们并未解释为什么其结论与布劳和邓肯的结论不同。不过,时至今日,多数西方学者还是认为,教育和收入决定了声望地位,而且教育和收入对声望地位的作用力差不多。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和教育水平是决定人们的声望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相同。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除了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因素以外,权力和单位因素也对中国人的声望地位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权力的作用力最明显,其对人们声望地位的影响力大于教育和收入的影响,这是中国的声望分层与西方社会不同之处。另外,教育对声望地位的影响超过了收入的影响,这也是中国的声望分层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地方。在西方社会,教育和收入与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相关系数大致相等、接近,或者收入与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相关系数高于教育,也就是说,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因素对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影响力差不多,或者收入的作用力略大于教育(Blau & Duncan, 1967: 27; Lin & Xie, 1988: 830)。然而,有关中国职业声望的调查数据都显示,教育与职业声望的相关系数远高于收入与职业声望的相关系数(Lin & Xie, 1988: 830; 许欣欣, 2000: 2),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也证实,教育与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相关性高于收入与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相关。因而,掌握文化资本的两个职业群体——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声望地位(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高于掌握经济资本的职业群体——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显然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满意,他们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高于社会对他们的地位评价。

参考文献:

- 蔡禾、赵利卿, 1995,《社会分层研究: 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价值》,《管理世界》第4期。
- 蒋来文等, 1991,《北京、广州两市职业声望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4期。
- 李强、宋时歌, 1998,《中国人民大学职业声望调查表明科学家高居榜首》,《职业教育研究》第1期。
- 陆学艺主编, 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许欣欣, 2000,《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叶南客, 1997,《南京市民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社会》第1期。
- 折晓叶、陈婴婴, 1995,《中国农村“职业—身份”声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Blau, Peter M &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Clark, Terry N. & Seymour M. Lipset 1991.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6
- Duncan, Otis Dudley 1961,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in A. J. Reiss (ed.) *Ocu-*

- 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New York: Wiley.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Goldthorpe John H. & Heith Hope 1972, "Occupational Grading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Methods and Approaches*, (ed.) by Keith H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smick, H. G. 1976 "The Occupational Prestige Structure: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pproach."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7.
- Hauser, Robert M. & John Robert Warren 1997, "Socioeconomic Index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 Review, Update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ed.) by Adrian Raftery. Cambridge: Blackwell.
- Hall, John & D. Caradog Jones 1959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
- Hatt, Paul K. 1950 "Occup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5.
- Hout, Michael, Clem Brooks & Jeff Manza 1993, "The Persistence of Class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
- Inkeles, Alex & Peter H. Rossi 1956,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1.
- Lin, Nan, & Wen Xie 1988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 Lin, Nan, & Xiaolan Ye 199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Rural China." (Draft)
- Nisbet, Robert A. 195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cial Class."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2.
- Parsons Talcott 1954.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Treiman, Donald J. 1976, "A Standard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for Use with Historical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7.
-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 W. Lloyd 1949, *Social Class in America*.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 Weber Max 1966, "Class, Status and Party."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s.) by Beinhart Bendix & Seymour Lipse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

social stratification b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ina’s 200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e major reason for it is the resident permit system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The inverted T-shaped structure causes the structural strai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gaps between the two social groups are enlarging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social exchanges between them. Most social problem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inverted T-shaped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strain.

Prestige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Occupational prestige measures and socio-economic index *Li Chunling* 74

Abstract: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data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prestige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and socio-economic index.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ctors determining individual’s prestige position are education, income, power, the pattern of work unit, and holding discriminated occupation. It also shows that values of universal industrialism dominate Chinese prestige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pluralistic values have impacts on the evaluation.

Institution and Participation: A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the unemployed to pay for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Bi Xiangyang* 103

Abstract: Based on describing the status and mode of the unemploy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ion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by a statistical model from quantitative data and some qualitative material from in-depth interview, this article gives a primary explanation for several factors that impose on the behavior of the unemployed to pay for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factor, incoming factor as well as individual facto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is of most significance, the individual factor takes the second place, and the incoming factor isn’t relatively remarkable. The significance of institutional factor suggests that the problem of low individual purchase ratio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is caused by the institutional hindrance. The relatively low ponderance of incoming factor does not corresponding with some common viewpoint and the accustomed attribution of the unemployed themselves. However, combining with the fact that individual factor is quite significant for the choice whether to pay for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or not,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ome space for the choice of these agents, although they have to confront the double hard constraints from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budget. Whereas this isn’t the common calculation under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but is the choice under the subsistence ration, which manifests the tolerance, adaptability and strategy of their social action in the face of disadvantageous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heriting and Reflecting: Notes on three ethnographic restudies in Yunnan *Wang Mingming* 132